

基于儒道互补视角下文人隐逸的形式演变略论

臧倩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自先秦开始儒家与道家在发展中已成为影响文人思想的两大主力体系，两者之间既有各自体系的特点，也有共通之处，更在影响方面有互补趋势。根据李泽厚“儒道互补”的观点，分析儒道互补对文人园林形成的影响，以及传统思想对于物质文化产生的思想性探析。

【关键词】儒道互补；隐逸；文人园林；士

探究中国古典艺术，其思想内涵无外乎先秦诸子百家的根源性影响。以儒、道为首的百家思想，在文化思想演变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思想与物质的发展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影响传统文化思想和物质产生的直接因素，即先秦文化思想对历史文化进程的整体定义。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从发源时沿用至今，仍然是中国教育文化中的中流砥柱思想，无论文化在发展历程中如何细变，也都万变不离其宗的保有主流思想，且在不同文化的融合中生生不息的发展。二是影响传统文化思想和物质产生的间接因素，即朝代更迭、民族特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对各朝代文化的局部定义。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朝代有不同民族的统治者会推崇和发扬统治民族的特色文化，可理解为上行中的发展细变。

一、儒、道对“士”的定义与影响

朝代更迭频繁的魏晋时期，频频战乱影响下使很多文人、士人在个人思想层面有了觉醒，文人、士人是主导社会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一类人，这一部分人推动者思想发展与变革。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多次提出士肩负着社会责任，为谋求国家和百姓的安稳生活而任重道远。归其基础理论就是儒家思想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最早是在春秋时期由孔子提出“士志于道”。说文解字中也有记载：“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从字的结构上看，士乃推十合一而成，数始于一而终于十，十博而一约，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士能够具备探究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即一种将复杂的问题中的重点分辨出来的能力。老子道德经提到“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以前的志道之士见解深奥通达，不能为人所理解。儒、道两家对道与士的见解各有不同，也有相同。儒道是治国安定天下之道，儒家规范人的思想道理，也皆为士的思想品德，儒家主张世入效仿士的德行，也要求士要担当大任。道之道是自然万物之道，以朴素辩证法解释事物发展规律为准绳，以无为成行为，在人的内心领域有所贡献。然“承道者为士，士之博广深识”是两家思想的共同点。于此，士也肩负了重大的社会责任。乱世中士这类人意识到人的生死是必然性，从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转变为注重人的价值。从此由仕转隐，成为林中隐士，或有终身不仕之士。从先秦时期的游士，秦汉时期“士大夫”阶层，魏晋时期的隐士。魏晋时期隐士文化蓬勃发展，达到隐士文化发展的顶峰。魏晋的人文意识觉醒是这一时期思想繁荣发展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源于士人崇尚隐逸、高蹈遁世、远离喧嚣尘世，归隐山林寻求自身乐趣。关于人文思想觉醒，14世纪-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与魏晋时期的士人文化觉醒有共同点——开始为人的思想。文人士人欲不为乱世英雄，以高

蹈遁世、闲逸雅致、明哲保身而为之。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与中国历朝时间线对比已经是明朝，然而魏晋时期的意识觉醒已早于西方一千多年。

二、儒、道在文人、士思想中的体现

儒家和道家在我国思想文化启蒙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是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体系，另一方是以老子哲学思想为核心的老庄哲学体系。士人、文人多以追随儒、道思想，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汉代儒学盛行也影响了文风的创作趋势，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自从光武中兴后，东汉时期的作家所走的创作路线发生改变，无论内容还是文辞，都以儒家经典作为依据，此时文人的创作已趋向儒风。东汉浓厚的经学风气，对文学创作影响是广泛的，此时期作品都带有儒学的特色，刘勰也在文中写道：“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东汉的文学作品提笔成文就要“斟酌经辞”没有创新性的突破。直到汉朝结束儒家思想的影响气势才逐渐消减。东汉末年，魏晋初始。文人思想逐渐突破经学束缚，他们对写文创作有所觉醒。曹植在《赠丁翼诗》中感叹道：“淘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这时，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有了由盛转向平淡的趋势发展。然而道家思想魏晋以前被世人认为是消极的思想，隐居也被认为是消极避世。却在魏晋时期深得文人士人的追捧，从而促进了文人隐逸思想的发展。在现代角度来看，隐居山林是一种接受现实，甘于平凡的思想观念。东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达观态度，豆苗虽稀，也对归田隐居乐得其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这般品格与精神也着实为隐士一类名号浓墨重彩一笔。这股潮流趋势随着朝代变更等因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明显的是归隐方式上的变化。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有无之间辩证的看待事物，道德经以五千余字，构造了朴素自然的宇宙观、飘逸豁达的人生观，以及客观实用的方法论框架。老子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体系，诠释了他所理解的规律变化。

三、儒道互补观点分析

儒道互补的理论出自于李泽厚所著《美学历程》先秦理性精神章节的第一篇。对先秦儒、道美学关系的定义。其中，作者认为“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学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道两家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互补，老子《道德经》中论说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然儒家《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老子认为最有修养的人像水一般，水善滋养万物而不争，处在大家最厌恶的地方，所以更接近于道的真谛。此句中“大家最厌恶的地方”指的是儒家主张“恶卑下，力争上游”的思想，与老子的自然无为恰恰相反。在道德经中，老子态度鲜明地论述与儒家对立的思想，直言不悔的指出儒家思想恶下争上没有领悟上善的真正含义，即无为而几于道。由此，在老子与孔子的写文中证实了儒、道两家的观点存在对立，在后世传承的文人思想上凸显互补特点。二者思想的对中国人的人生观的建立是互相取长补短的，甚至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四、文人隐逸与文人园林

上文中（儒、道在士人思想中的体现）提到，隐士在归隐方式上有明显变化。由最初时期的“实隐”演变为“半隐半仕”，再到“虚隐”。隐居文化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这也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动乱有关联，如：南北朝动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这些朝代动乱变迁都牵动着文人、士人的心。“实隐”是指入山隐居，不问世事的隐者。我们说这种隐逸就是隐逸行为呈现的初始形态，后来的一切隐逸形式都是在初始形态的基础上的演变与丰富。这类隐逸是完全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如老子一般“悄然隐退，不知所终”。“半仕半隐”是指仕途没有完全断送的情势下，入山寻求心的归隐（如唐代诗人王维），士人阶层通过这种方式暂时规避，等到势头正好再次出山。“虚隐”顾名思义，并不“栖林野处，灭迹城市”，而是一种市隐。市隐的兴起也带动了文人园林的发展，文人们辞官归来，将山林风景建在自己的住所，仿佛身临其境般的隐逸形式。这种归隐并没有回避世俗，只是一种文人对隐逸的憧憬和向往，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隐逸”方式。

文人园林的与其他园林不同，它们是建在文人审美点上的文化遗产。文人园林是思想内涵抒发与自然实践的产物。儒家思想虽对与园林造景没有直接的思想指导，但其将文人的风骨气质控制的淋漓尽致。在明清时期，以造园形式来追求隐逸的文人们，即使心向往之隐逸，也不会效仿前辈真正的归隐山林。文人们大都考虑到独自归隐且脱离世俗是不可行的，既有至亲好友不可负。即使是名声劣迹的阮大铖亦有此志：

余少负向禽志，苦为小草所继。幸见放，谓此志可遂。适四方多故，而又不能违两尊人菽水以从事逍遥游，将鸡埭、豚栅、歌戚而聚国族焉已乎？

銓江地近，偶问一艇于寤园柳淀间，寓信宿，夷然乐之。乐其取佳丘壑，置诸篱落许；北垞南陔，可无易地，将嗤彼云装烟驾者汗漫耳！¹

从阮大铖的自叙中能窥探到当时文人们采用的隐逸方式，即上文提到的“虚隐”。“余少负向禽志”大批文人自小受到书中隐士文化的熏陶，有了隐逸的志向。

这个朝代的文人自小就受道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与明朝时期的思想开放、经济繁荣的大背景有关。“苦为小草所继”小草出自《世说新语》：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至，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余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秽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世说新语·排

调篇》）²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外篇·秋水》）³

上则轶事与《庄子·秋水篇》这段描述有相似之处，基于同种情势下的不同结果。庄子将自己比喻为“庙堂之上的龟骸”与“泥水之下的活龟”，并不直接回绝，言语妙极。谢安在任职司马之前也谢绝了一些职位，尽管谢安出仕与庄子继续隐居两者结果不同，但也都崇尚隐逸。阮以该则轶事中“出则为小草”的相同处境来表达自己被仕途牵绊，这是不能过隐士的幽闲生活原因其一。此外，也不乏有叙者抬高自己志气的成分，为自己舍弃不了市井生活而找理由的说辞。

“而又不能违两尊人菽水以从事逍遥游”是叙者不能避世隐居的原因其二。明朝以儒学为主流思想背景下，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为儒家思想底蕴，笼罩着当时社会。儒家对士阶层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有隐居避世的想法也受到束缚而不能为之。这对“儒道互补”这一理论有了更深的认识。叙中认为既要遵守儒家思想的忠、孝，又想为自己开辟心灵栖息地。那便将园林“搬到”园子里来，这就有了文人园林。在文人内心和行为之间满足了儒道共存的局面。此“叙”的思维融合了儒道的特点，以道补儒，以儒互道。既儒又道是文人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人们迷惑时行为思想的指路明灯，那道家思想就是人们失意后内心世界的排忧解难药。人生百味，二者皆入文人心田。

五、小结

从儒道互补理论对文人园林进行溯源，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文人园林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其所承载的不只是建筑表面所呈现的思想，还有演变过程中，传统文化所传承的思想进化，由儒道互补到儒道实践共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探索物质文化本身的同时，应重视文化溯源因果关系中产生的变化与表现。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2] 饶尚宽译注. 老子 [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3] 方勇译注. 庄子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4]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上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5] [南朝宋]刘义庆，朱碧莲、沈海波译注. 世说新语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李泽厚. 美的历程 [M]. 上海：三联书店，2019
- [7] 汉宝德. 物象与心境 [M]. 上海：三联书店，2018
- [8] [明]计成. 园冶 [M]. 北京：中华书局，2019

作者简介：

臧倩（1996.12—），女，汉族，籍贯：山东青岛人，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设计学，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1 [明]计成. 园冶 [M]. 北京：中华书局，2019

2 [南朝宋]刘义庆，朱碧莲、沈海波译注. 世说新语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方勇译注. 庄子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